

自主知识体系下国际政治经济学 奏出的“二重曲”

黄琪轩^{*}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谈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杯酒，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如果我们小小的头脑，为方便起见，把这杯酒，把这个小宇宙分成几个部分：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心理学等。请各位记住，大自然并不知道这些！”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各分支学科，如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是学术共同体为了科研探索与课堂教学方便划分出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从诞生之初就走在“新文科”建设前列。当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从授课到研究，面临一些新变化。其他学科也会不同程度面对这些新变化，包括新的参与群体、新的探索主题、新的学习模式以及新的竞争压力。

新的参与群体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主体超越传统师生。随着交通日益便利，网络更加普及，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有着更广阔的受众。除了在大学课堂的学生，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研发人员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受众。广阔范围的受众打破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课堂的“师生关系”。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实务部门的实践者和大学师生之间互动交流，构成“亦师亦生”的关系，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

新的探索议题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超越已有教材眼界。正如物联网、3D 打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ChatGPT 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而传统课本聚焦恒定知识和稳固规律，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也由此面临变革压力。世界政治经济变化越快，传统课本承载的理論的生命周期也就越短。现实需求推动，鲜活

^{*}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实践补充让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日益超越教材眼界，把新事物、新现象、新研究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

新的学习模式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受众自主自愿学习。随着教学途径日益多元化，学生选择的学习模式也日益多样化。大量网络在线课程、公开课与开放的学术讲座带来了“学生主导的学习”、“大规模开放学习”、“基于探索的学习”以及“自主决定的学习”。这样的学习不拘泥于标准的课程考核，不局限于完整的知识体系。丰富多样的选择是对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课堂有益的补充。

新的竞争压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授课教师超越狭隘眼界。打开互联网，我们就能找到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习资料：你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哈佛大学杰弗里·弗里登关于全球化的讲座；你也有机会在中国大学校园跟随康奈尔大学彼得·卡赞斯坦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不仅面临国内同行的竞争压力，“世界是平的”，“课堂是平的”，讲授“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师还面临来自全球同行的竞争压力。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以往的知识体系、课程内容、授课手段与学术眼界日益打开，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大家“再次开眼看世界”。在诸多新变化面前，笔者用“二重曲”来展示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在追求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呈现的一些迥异却并行不悖的特点。

第一，“超大市场规模”促成了“分工”与“综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前三章集中探讨“分工”。他展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中国市场规模大，世界日益互联互通，一个更大的受众群体呈现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面前。受众广阔支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内部更为精细的“分工”。就中国高校课程名称来看，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安全等。和斯密的判断一样，中国的超大市场规模支撑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研分工与教学分工日益细化。同时，更为广阔的受众在促成相反趋势初现端倪，即走向新一轮“综合”，走向新一轮“知识大融通”。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参与者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现在的参与者带来了新的“知识贡献者”，打破以往的固化分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机制是有限的，会被不断重复，会在不同学科领域重复，乃至会在文学作品（如《三体》）中再现。因此，当前的“综合”不仅在试图融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各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乃至在融

通“文学”。不同群体,不同学科的新人在帮助国际政治经济学提炼重要机制。从课程到专著,“通论”“通识”等不断涌现。“分工”与“综合”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奏出的“二重曲”。

第二,“新的动荡变革期”推动的“自主”与“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强调:战争风险与安全压力促使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与技术“自主”。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强调在外部压力下,各国会加强“自助”“自主”来保障安全。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都更加重视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用中国视角来整合世界知识,将民族特质融入普遍规律。和中国技术“自立自强”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文论著中日益可见这样的努力,日益涌现出一批有中国特色、有原创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探索。相关研究关注边缘地带发展,关注礼治秩序。在外部竞争压力下,为“生存”“发展”,也需要“开放”,通过开放,学习强者,壮大自己。国际政治经济学因而也呈现出不同趋势,追求更大程度的开放,通过开放,学习强者,服务国家安全;通过高水平开放,实现的“文明共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来著作的引介就一直没有中断。当时大学图书馆便能找到翻译成中文的灰皮书、蓝皮书、白皮书,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文明。在面临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学界坚持“批判借鉴”“学习强者”,和苏联构成极大反差。缺乏外部学术联系的苏联,其大学图书馆罕见类似外来政治经济译著。所以当苏联知识界重新阅读外来著作时,表现得更缺乏反思,更容易走极端。当前,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下,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强调“自主”的同时仍在加强学术的高水平开放,一直在翻译、一直在比较、一直在共鉴。“自主”与“开放”是国际政治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奏出的又一“二重曲”。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下的“规整”与“多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牛津大学多有抱怨。他说:在牛津大学,大部分教授许多年以来甚至已经完全放弃了假装在教学。这是因为,享有官方垄断地位的牛津大学教授缺乏竞争压力。中国一流大学均为政府创办,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与教学在中国大学里均比较“规整”。和西方大学多样化的教材、个性化的大纲、多元化的阅读材料不同,马工程《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出版让全国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有了更规整的范例;持续举办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

不断汇聚各方研究力量以形成学科共识。中国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在“规整”中稳步推进，缺乏西式“竞争”，却没有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都保持了较好“稳定性”。正如在德国，员工在一家企业就职几十年，而在美国则为几年。稳定的工作环境支撑了德国企业持续的经验积累和强劲的渐进创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职业相对稳定性带来了这个学科逐渐形成：没有输赢的竞争、并行不悖的共生、互助共赢的成长。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等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都有自己的平台、都有各自的听众、都有研究的侧重，都能在较好的职业稳定性下展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和尝试。在缺乏西式竞争的学术共同体中，不仅有“规整”，还有并行不悖的“多样”。从论文发表来看，中国学界没有被“IO”体（《国际组织》期刊的论文样板）所统一，学术成果从研究选题到写作风格，都呈现极大差异，风格各异、各具特色。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旗帜下，中国学者既做普遍理论，又做特殊规律；既做中国研究，又做区域国别；既用科学方法，又用多样手段；既做精深学理，又做经世学问。这是一个多样共存的知识演进平台。大家在分散中试错，从错误中学习，不断尝试积累，逐渐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知识体系。这既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又为研究者的互动互补、竞争共进提供了稳定预期。“规整”与“多样”是国际政治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奏出的另一“二重曲”。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认同，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持续努力汇聚了一批学者。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在细化的“分工”中提升“综合”水平；在追求“自主”的同时保持“开放”心态；在“规整”中追求“多样”，共同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经济开放、经济安全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创新

李 巍^{*}

近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的热度有明显下降趋势，笔

*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